

西安營心得

陳柏言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今年（2018）四月，我趁著春假來訪過西安。

那時住在驃馬市步行街，旅店門口有一株盛開的櫻花樹。一夜大雨，落葉紛紛，離開前花瓣正好落盡。假期非常有限，遊覽只能經濟。跟隨「背包攻略」網上知名景點 run 過一遍，也算是遊歷了西安：小雁塔、大雁塔、碑林、陝博、鐘鼓樓、兵馬俑、青龍寺、明城牆、漢陽陵……，亦連走帶爬，登上華山，和「論劍碑」合照打卡。光是寫下這些文字都讓人感覺疲憊，實因為西安太豐盛了。旅人總是行色匆匆，睜開眼就有無盡的東西可以看，可以觸摸，可以輕易的「撫今追昔」。彷彿韓少功《馬橋辭典》那一句話：「隨便踩一腳，都踩到漢代以前去了，腳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……」

非常幸運的，同一年七月，獲得機會再訪西安。後一次跟隨師友，包袱更沉，行程更滿，心情卻更篤定了。對我而言，此次營隊行程最珍貴的，是讓我們重溫久違的「群體生活」，與來自不同學養和知識體系的師友，一同討論學習。在近代學科分化的發展下，我們的學術生活，更多時候是閉門造車，與同一個學門的師友交流。我們習慣劃定研究範疇，規限研讀材料，全心全意浸淫其中。那確實令我們學有專精，然亦可能使我們失去更多的東西。

或許是「閱讀的樂趣」，乃至於「詮釋的樂趣」本身。

我出身於文學科系，學的始終是中國文學。即使努力抗拒，卻也難免抱持文學本位的成見。在我所受的文學訓練中，總習慣將歷史脈絡視為背景，甚至簡化的看成「政治因素」、「地緣因素」、「文化因素」……，文學要如何與歷史對話，如何在歷史中認識文學（或在文學中認識歷史），成為此次研習營，我始終放在心上琢磨的課題。

說來好笑，在我腦海裡，常有「小說才是王道」的想法——已有那麼多案例為我們指出，歷史往往是可疑的；個人的記憶、細小的的心曲，可能回過頭來補足，甚至是反噬人們對於歷史的既有認識。這次營隊成員的組成，小說研究實處於弱勢——整個營隊中，似乎只有我一人的研究領域是古典小說（這亦是某種邊緣的隱喻？）。在與同組組員的對話，乃至於綜合討論中，我才驚覺學友們對於「小說」

一詞常懷有偏見。最習見的，無非是通過「虛構／真實」的二分法，來指稱何謂「小說／歷史」，乃至於驗證是否為「有價值／可信的史料」。那亦讓我進一步反思，古已有之的「小說」，是在什麼時候成為我們今日的「小說」？

相較於詩、文或戲劇，「小說」作為文類一種，似乎被今人視為較難界定的概念。原因之一，「小說」在傳統目錄學中，即是一個混雜的集合。其不只指故事，亦涵括了「叢談」、「辨訂」、「箴規」等知識性的筆記史料。原因之二，今人對於「小說」的理解，常不自覺仰賴西方關乎「敘事」(narrative)與「虛構」(fiction)的論述資源。1923年，魯迅正式將授課用的小說史講義，定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印行出版。此書綱舉目張，成為中國小說研究的開山之作。可以說，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建立了一套供後人理解中國小說的方法論。後人撰寫小說史，乃至於文學史時，都難以迴避此書。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時代意義，顯然不只是國故的鉤沉與清理，亦帶有「故事新編」(借用魯迅小說集名)、既故而新的現代(性)張力。魯迅通過此書(為什麼專治小說史而非散文或詩歌史?)，扣合自身的創作實踐，亦遙相對應著以梁啟超為主，一系列「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」的救國論述。從上述對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簡要爬梳可知，我們今日所說的「小說」，可能是一連串建構的過程(噢，「建構」，又是此次研習營的關鍵詞)，如何借用此夾纏後見之明意味的詞彙，回歸傳統語脈中理解「小說」之意義，正是我輩研究者須努力的課題。

非常慶幸，在本次課程中聆聽了田曉菲先生的講座。她的著作總是予人啟發。她往往通過鳥瞰的、文學史的視角，加以機智的細讀，賦予彼些已被學界大量討論的文本嶄新生命。此次她在課程講義中，開立諸多《太平廣記》精怪類的書單。因我曾在課堂上，寫過唐代少見的長篇幅精怪小說〈東陽夜怪錄〉的報告，因此對田老師的課程特別感興趣。對小說研究者而言，我會特別關注小說書寫的文體問題，例如李鵬飛、康韻梅先生指出的，〈東陽夜怪錄〉等精怪飲宴賦詩之作可能與「諧隱」的傳統有關。換言之，這些精怪以詩歌自我指稱，其實是一種文人間的猜謎遊戲與才藝競技。但我特別注意到其中，可能亦夾帶著中晚唐以降「盛極而衰」的文人末世心理。小說中，那些光鮮亮麗、飽富詩才的詩人，最後揭曉往往是一堆醜病的動物或破銅爛鐵。不過田曉菲先生延續宇文所安對唐詩中「人—物」關係的觀察，從精怪小說入手，為我點出了以往「小說研究」不太會注意到的、更為宏觀的面向，也讓我重思人與物，乃至小說與歷史的關係。

由於心得篇幅有限，沒辦法一一回顧課程，對各位老師(尤其是李仁淵老師)和主辦方的感謝之意也只能放在心底了。我最後想談的是，唐人段成式在《酉陽雜俎》中，曾有一篇類似〈洛陽伽藍記〉的著作〈寺塔記〉，其所記述的正是長安城中的寺塔。段成式寫下該文時，長安初經歷「會昌滅佛」之事，大量寺塔遭毀，僧眾被迫還俗。更重要的是，當年陪伴段成式遊歷寺塔的兩位朋友，都已亡故。也就

是說，〈寺塔記〉所記不只是已然消失的長安寺塔，更帶有傷悼與劫餘意味。段成式通過這樣既公眾又帶有私人情感的博物紀事（如胡曉真先生所引述的帕慕克的「純真博物館」），為我們留下已然覆滅的寺塔歷史。

我想，我期許的學術研究不也是如此嗎？它是公眾的，亦是私藏的；它是歷史的，也是情感的——或者說，這兩者從來不能分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所寫下的、所記憶的，往往也與真摯的友誼息息相關。